

论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制约机制

◇ 祝 昊

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是学界始终关心的论题,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人们对经典地位的确立又有了新的认知,将经典看作亘古不变的观点似乎业已过时。但是,诸如《荷马史诗》《神曲》等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推崇,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鉴于此,有学者将经典区分为恒太经典和流动经典,恒太经典即那些在历史上一直是有崇高地位的作品;而流动经典的兴盛则似乎是周期性的,随着具体的时代条件而变迁。实际上,经典的定位永远是一个开放而未完成的问题,经典的形成是其内部特质(如审美价值)与外部制约因素(如权力、读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经典的认定必须综合这两方面要素,单从一个方面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比较来看,恒太经典比流动经典具有更多成为经典的内在特质,而其是否具有超历史的本质,仍要在时间的不断检验中,在与各种外部制约机制的对话中才能得以说明。因此,本文研究的不是文学经典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即不追问已经取得经典地位的作品是从何时起确立其地位的,而是试图分析在某个时代影响其地位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就是影响制约经典生成的外部机制。

一、文学经典与权力

文学经典是现行权力的一种承载要素,当下的权力因素制约着经典的地位。影响经典地位的权力因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层面直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影响,是经典地位形成的前提条件;其次,文学权威,它是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经典的评价,是文学领域内的权力要素。这两种权力还与社会及文学思潮紧密交织在一起。

(一)文学经典与意识形态

作为具体的文本,文学经典是创作主体与审美

主体之间的中介,它不能脱离二者而孤立存在。由于三者之间的不可割裂关系,作为文本的经典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都是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的制约,这种关系会渗透在主体的创作和阅读活动中。除具体的文本生成过程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文学经典在其价值被定位的社会过程中,与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文学经典社会功用的发挥,要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干预,这是一种硬性规定,通过国家的直接宣传来实现;二是布尔迪厄所谓的“荣耀”状态,即组织的客观秩序和主观原则之间存在着类似完美的联系,它力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灌注于人们心灵,使人们认为事物天生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方式比前一种往往能够更为有效地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当一种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时,这种价值观念也就有了坚不可摧的力量。意识形态对经典的影响往往更多地通过前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官方意识形态在经典形成过程中起着最为基础的制约作用,它对于文化领域的控制决定了作品的现实及其在当时文学史中的地位。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机构会以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为准绳,考察其是否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而为之定位,这就成为决定作品当下地位的前提。具体而言,一部刚面世的作品,在具有良好艺术价值的前提下,认同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旋律相吻合的作品,自然会得到官方权力机构的认同,利于其在社会中的传播与推介,进而利于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而对于那些流动经典或恒态经典而言,权力机构还是要对其加以审视的,会对这部作品所能潜在发挥的社会影响做出“评估”,进而决定此作品能否在社会领域中

传播。一般而言,恒态经典具有意蕴包含的丰富性,具有多种读解的可能,所以基本上会包含与当前社会主导价值观相符的东西,一般会得到权力机构的认同。尤其是真正伟大的作品,都对人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人类永恒追求的真善美等价值进行了描绘,这都是政府部门倡导的核心伦理或价值观念,所以恒态经典一般都会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或被大力推广。

对流动经典则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当下意识形态对其地位的认可是较为审慎的。这些流动经典地位经常变动的的原因,或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因素过于直接,明显与当时倡导的价值观念相悖;或是由于其不符合当下的社会价值观而被“遗忘”。流动经典的地位变迁在我国新时期前后有明显体现,如新中国成立初国家倡导“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因而催生了当时的“红色经典”,并对其他作品进行了抑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文艺观的纠正及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强调,促进了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的彰显,便又得到权力部门的认可,而以往的“红色经典”的影响则大不如前。在流动经典的地位变迁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综上,官方权力机构对作品的态度,通常是以作品所能发挥的社会价值为标杆的,它对于作品地位确立的影响是宏观层面上的,偏重于外部,是在大方向上对作品的推介与否做出制约。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一个具体时代内,意识形态对经典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甚至直接关乎作品的生死存亡。但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多方面因素(如作品艺术特质、时间的过滤)作用的结果,所以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每个具体时代对整个经典流变史的影响似乎又较为轻微。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区别地看待,由于不存在超历史的经典,经典的地位是否得以确认,最终还要由当下生活的人来确定,现实社会关系造就的意识形态就又不可忽视。这就是意识形态影响的双重性,充分体现了作品经典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对于这种影响我们要区别看待,不可一概而论。

(二)文学经典与文学权威

与官方权力机构在宏观大方向上把握作品最终决定权不同,对于具体作品价值的认定,则是由文学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进行的。相对于大众读者,他们掌握着确定作品价值的微观话语权,凭借着对文学规律的把握及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能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做出专业判断。他们在作品价值判断方面的权威地位,自然会影响到一部作品在国家机构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例如陶渊明诗歌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就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作用。陶诗在其产生之初并无太大影响,直到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对其进行大力推介,才使其在唐代开始被人注意,并得到一些好评;到宋朝时由于苏轼对陶渊明的极度推重,又使得陶渊明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文学权威对于经典的发现或批评较普通读者都具有更大的左右力量,但文学权威对经典地位的调整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会掺杂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素,所以对文学权威的作用要理性看待,不能过度信赖以至盲从,不加鉴别的轻信或盲从不利于经典发现途径的多元化。

文学权威对作品价值的评定与当时的文学思潮也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往往会促成一批新的文学经典的产生,在文学权威的推荐下,它们也会在人们心中占据显要地位。同时人们也会以新兴思潮中的术语和原则来衡量原有经典,对其当下地位给予恰当评定。文学思潮对确立经典标准的影响,就在经典话语地位的调整上有所体现,例如T.S.艾略特对于玄言诗地位的重新界定等。

国家对文化领域、文学作品的控制,也会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主张下,文学一直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确认文学经典的标准也就成了是否利于阶级斗争。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控制的放松,使这一领域内的专家学者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一般而言,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是较为客观公允的,是偏重于从作品的艺术价值角度出发的,所以如若文学权威能更好地掌握经典确立的话语权,就会促进经典确认标准向侧重于艺术价值方面倾斜,向更具美学归属的方向发展,最终利于文学按照其内部规律健康地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虽然文学在当下的

地位日益边缘化,当年风光不再,但对文学的未来发展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文学经典与传播媒介

作为传播的重要手段,今天的大众传媒在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在前工业社会条件下,由于受技术条件等的限制,文学传播的方式以口耳相传为主,虽有印刷术但并不普及,所以传统社会的传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只能是精英型,即由少数知识精英掌控社会。而在进入信息时代的当下社会,新的传播媒介,尤其是新兴网络媒体的兴起,在根本上革新了传播方式与手段。比较来看,恒态经典比流动经典具有更多成为经典的内在特质,而其是否具有超历史的本质,仍要在时间的不断检验中,在与各种外部制约机制的不断对话中才能得以说明。因此,在对经典流变产生的影响方面,新兴媒体既有积极的建构作用,又有消极的解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就积极方面而言,恒态经典在当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在以更先进快捷的传播工具为载体的社会条件下,恒态经典可以更广地扩大影响范围,为更多读者阅读和接受,价值也有了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同的可能性,所以新传媒为传统经典的现代转化提供了良好空间。新兴的电子书、在线阅读或影视剧节目等新形式对经典的推广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新近产生的作品如网络小说等,它们凭借着与新兴媒体的天生亲缘性,会很好地促进自己的传播推广,因而在吸引读者方面利于其“经典”地位的确立。

但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网络媒体等新兴传媒对恒态经典的地位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如当代社会对于经典的改编,多充斥着“戏说”之风,在经典中加入了浓重的“现代”气息,在根本上改变了经典原貌,网络小说的创作也是鱼龙混杂,这些都不能不左右着读者的接受与认知。并且新兴的文学形式如网络文学等对传统经典的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快餐文化”、“一分钟阅读名著”等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理,认真完整地阅读经典名著的人越来越少,无怪乎许多专家学者惊呼,“经典消亡”的时代已经来临。

新兴媒体除在传播等方面影响经典地位变革外,传媒还发挥更大的社会功用,即它与权力因素及读者因素相结合,会产生更强的社会效果。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国家大力推介的作品,传媒会利用自身受众面广的优势,积极推广,加大该作品的影响,促进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或巩固;二是对国家禁止或否定的作品,媒体的集体“封杀”,会切断该作品的传播途径,当然会制约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或改变。还有一种方式即,对于民间反响强烈的作品,作为中介的传媒也会大力推介,甚至会引起文学权威及国家权力机构的关注,有可能将其进一步追认为经典。

三、文学经典与读者

读者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得到了高度重视,读者接受文论等流派将读者作为作品完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他们看来,作家创作完成的只是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本才能成为作品,进而才能产生意义与价值。而读者反映批评等流派更将读者地位推至极端。所以对于读者因素要理性地看待,既要看到其对文学活动完成的重要作用,又要认识到它也只是文学活动中的一个要素,最终还要和其他要素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经典作为文本,离不开读者的参与。从理论上讲,读者应是经典地位的直接表现因素。真正的经典必拥有大批读者,而非经典作品则受众较少。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况,玛丽林·巴特勒在《重新占有过去:一种开放性文学史的个案》中指出:“影响文学的条件总是不时地改变着。印刷术的发明,闲暇时间的增加,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书籍生产的机械化等,都不断带来新的读者,而这些新读者最终又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书籍。”正是这些客观条件与读者主观条件的沿革及相互作用,构成了制约经典流变的机制之一。在现实生活中,鉴于大众读者的鉴赏水平、审美趣味等原因,短时期内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未必就是经典,或许只是迎合了市场需求,而其艺术成就或许并不高明。所以,对大众读者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还要和时间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读者并不仅仅是文学活动的参与要素,还发挥

着更为积极的主动作用。作为经典的最终接受者,由专家推荐的文本,是否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最终还要经过读者的阅读检验。尽管读者阅读通常只能在国家选定的范围内进行,但具体到阅读过程,读者却掌握着主动权。能激发高度审美体验、引发强烈共鸣的艺术作品,读者当然会对其加以认同,进而利于作品经典地位的形成或巩固;反之,若作品反响平平,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所以民众在经典形成过程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并不直接掌握话语权,只能从已被鉴别的作品中被动地选择接受;但另一方面,一部不能引起读者反响的作品,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当代读者获得了更大的主导作品的机会。民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及审美品位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做出自己的审美判断,还会与权威进行对话交流,最终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下影响到经典的生成或流变。这些都为经典的确认增加了新因素,使影响经典确认的过程更为复杂。

结语

作品的经典性焦虑希冀自己在历史中拥有一个明确稳固的位置,但经典的形成与流变机制却使经典的这种焦虑无法消除,因为经典地位的确立是多方参与的结果,与时间因素也有一定关联。

时间是检验文学经典与否的最终标准,一部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以时间的过滤为必要条件的。短时期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当时或许被推崇备至,但若确立其历史地位,最终还要交予未来加以检验。只有在经过时间的长期考验后,作品的优秀艺术价值得到了证明,并在与各因素综合作用中,其地位才能予以确定。历史是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主体生存的历史性,也就决定了没有亘古

不变的经典,恒态经典也仍然要接受时间的继续检验,与历史发展一道,继续其定位自我的过程。所以经典的确认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这是一个永远充满动态的过程。曾经的经典不会一劳永逸,未被确认的经典尚充满无限的可能,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制约文学经典变革的机制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源在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或许可以用来描述当下的后现代社会状况。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弥漫于社会中,在根本上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很难再有生存的空间。尽管“颠覆一切”、“消解一切”的口号具有极端化倾向甚至虚无化的危险,但重估原有价值观念、以更具理性的姿态来观照习焉不察的东西无疑具有宝贵的价值。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带动下,国家极力宣传的意识形态、文学权威“一言九鼎”的作用都要经过读者的仔细思考才能发挥作用。读者反思能力的提高,也使经典的生成与流变面临着新变化。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当代社会对于文学经典的认识也会发生新变化,是传统经典继续“稳坐其位”,还是最终被新的经典取而代之,抑或二者各行其道、并行不悖?这些都有待于最后的时间来证明。所以文学经典不是永恒的,其生成与流变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一切经典的地位都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

作者简介:祝昊,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自《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